

无线电在反『围剿』中的运用 中央苏区时期

□ 孙伟

1928年夏党的六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早期无线电人才。无线电战士被誉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还鼓励他们“要做革命的‘鲁班石’”。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形成了高效、严密、通畅的无线电网络，加上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破译与通信人才队伍，无线电在数次反“围剿”中发挥出色，为红军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起到重要作用。

侦察、监听敌台

红军利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敌军的“一部半电台”，于1931年1月6日在红军总部驻地江西宁都小布成立了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不过暂时还不能互相通报。一直到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电台主要干两件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当时由于根本没有料到红军能掌握并使用电台，所以国民党部队的电台几乎没有保密意识，开始联络时，都要先打个“QRC?”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谁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而对方回答时则又用明语，因为敌军部队很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这样一来，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其部队的行踪和部署。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利用缴获来的无线电收报机监听、抄收国民党电台的新闻电讯稿，就成为与外界沟通的一条便捷途径。朱德和总部其他同志都经常来听新闻，有一次毛泽东还称赞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呀！”此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对这项工作愈加重视，认为无线电收音机所收敌人的电报，“确有使我们对付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不少的帮助”，并准备扩充无线电组织。曾任红军报务员的邹毕兆回忆，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建立的每个无线电台，除了通信以外，都兼做收听国民党军队电台报告自己所在地名和报告他是隶属哪个部队的工作，还抄收南京中央社发的新闻。瑞金中革军委和前方总司令部都还有专门的侦察台，获取将军的位置。

破译敌台电文

随着敌军通信保密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各种密码的使用与经常更换，使得红军要获悉敌军的动态就必须破译对方密码。红军手头没有现成的破译经验可循，没有专业的指导，没有破译学教材，更没有先进的解密分析仪器，难度可想而知。于是，破译与反破译的较量成为这场暗战的最大亮点。

红军总部一方面要求前线部队注意搜集敌人的密码本及俘获敌军电台人员，另一方面组织专门的力量从事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一项比较复杂、不易掌握的技术，被称为“读天书”。该工作主要由中革军委二局负责，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因本领突出、工作拼命、热情极高，故被称为“破译三杰”。他们往往先从破译敌人最常用的简语入手，逐渐弄清敌人各部队的番号、驻地和长官姓名，然后再依据敌人的公文格式和明码底本，一字一句地破译，终于掌握了敌人的密码规律。

1932年10月首破了敌人“展密”，这样，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口令、信号，乃至内部派系斗争等深层次情况，红军很快都掌握了。到1933年八一节前，已经破译出100个密码，副局长钱壮飞取名为“百美图”，平均两天多破译出一个密码，为此二局还搞了个庆祝会。中革军委在八一节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了奖章，朱德、周恩来亲自到二局颁奖，并在大会上讲话。“破译三杰”都得到了二等或三等红星奖章。

1933年2月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敌人刚使用“猛密”不久，即被曹祥仁和邹毕兆破译。根据截获的敌军情报，红军主力进行设伏，全歼第五十二师，围歼第五十九师大部，俘虏两个师长李明、陈时骥。公审大会上，两人气焰嚣张，认为己方武器精良，对败在红军手下很不服气。这时，曹祥仁愤怒地跳上主席台，附耳将他们通联的密电当场背出。两人目瞪口呆，垂头丧气，俯首认输。

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率部赶至黄陂时，看到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歼灭的惨状后十分痛心，终日闷闷不乐，有感而发写了四句诗，后两句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当时，他惟恐这种消极情绪波及部队，没有示人，仅用电报将诗发给了在上海的夫人。红军截获了这封电报，破译后转呈周恩来。西安事变后，李默庵一次在西安偶然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寒暄之余脱口讲出了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说写得不错。李默庵闻知详情后脸色大变，震惊于红军无线电侦破的超强能力。

确保红军内部通信联络安全顺畅

红军内部的无线电通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向到双向、再从双向到多向，最后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过程。

当只有“一部半电台”时，还不能建立相互间的通信，便采取了单向通信的方法，即伍云甫、王诤、曹丹辉等人带一部完整的电台随毛泽东、朱德在前方。曾三、刘寅等人带上那部收报机在后方，密码和一切联络规定都事先约好。前方有电报就架台发报，后方台24小时不间断守听。这样，后方就可以很快得到前方的消息。

在缴获公秉藩师那部100瓦大电台以后，他们就在后方进行调试，准备和前方正式通信。第二次反“围剿”五战五捷，红军攻下福建建宁后，于1931年6月2日，后方总部用100瓦电台同在前方的红三军团第一次沟通了联络，彼此发了一份短报。从此，开始了红军无线电通信的新局面。

曹丹辉在1931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感叹道，从红军缴获白军的第一部收报机算起，到当天整整一年中，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通报的对象日益增多，这一情况也表明了红军的发展壮大。当时红军的通信单位有：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红一、三、五军团，粤赣军区，福建军区兼第十二军等，共有电台16部、机报人员80余名。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发展迅速，到后来大体上每个师都有一部电台，大大便捷了指挥作战。战时同友军进行及时联系，保持了很好的协同，互相配合作战。敌人一进苏区，就如国民党蒋光鼐和蒋鼎文打电报所说：“我们一进苏区找不到一个人，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

为了消灭敌人，红军常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作战，这对无线电联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红军内部上下有机联动、情报共享、敌情互通等工作，几乎每天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红色无线电通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1933年1月的浒湾战斗中，正是红五军团电台及时收到了红一军团电台发出的全歼枫山埠之敌的捷报，才化被动为主动，掀起了猛烈反攻，将长延庙之敌十四师击溃。

上海外线作战的全胜大捷

——上海市高桥烈士陵园纪念碑文敬读

□ 宋 斌

高桥烈士陵园坐落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欧高路钟家弄78号，原名高桥烈士墓，始建于1954年，是为永久纪念解放上海战役中牺牲在浦东战场上的解放军将士而兴建。经1956年和2005年两次改建后，目前占地面积25611平方米。纪念碑位于陵园悼念广场的中心，碑高19.49米，碑基座高5米，前方共有12个台阶直达碑前，寓意着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开始。碑身正面镌刻着陈毅题写的“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16个大字，在纪念碑后的黑大理石墙面上刻有“序言”和烈士名单，“序言”如下：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南下。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肩负重任，挥师上海。5月12日至5月27日，其麾下第二十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诸部将士，于浦东发动战役进攻。此役，上海守敌依仗精良武器钢筋碉堡，构筑立体防御多层障碍，妄图凭顽抗死命固守。为务求军政全胜之最大目的，实现两翼分兵，钳击吴淞口之战略部署，我英勇之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险，浴血攻坚，历经半月之昼夜鏖战，聚歼猬集于浦东之国民党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一军、暂八师；第十二军、第七十五军之大部，终获上海外线作战全胜大捷。浦东一役，为减轻我解放上海西线兵团压力，截断敌人海上逃路，彻底瓦解敌心理起到了重大作用。为解放大上海、建立新中国创立了不朽功绩。然我英勇之人民解放军将士阵亡牺牲者达千余人之多，其壮烈气概惊天泣地，日月永昭。

1954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敬斂战斗中解放军阵亡将士尸骸1368具，合葬于浦东高桥镇欧高路钟家弄78号，始有“高桥烈士陵园”之迹。其中，烈士有姓名籍贯者1080位，有姓名无籍贯者259位，有尸骸惜无姓名籍贯者29位。后又增斂1949年8月16日遭敌机轰炸牺牲烈士177位，1949年5月至1954年3月因公、因病牺牲烈士74位，皆享葬于此。故今名曰“上海战役浦东烈士英名碑”盖骨

者合计为1619位。为缅怀烈士、悼念英魂，历年来各级政府拨款出资，各界民众捐赠襄助，使烈士陵园得以多次整复，规模日渐，现已成为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今日之上海浦东，改革开放成绩斐然，经济发展世界瞩目。俾不致先辈功迹湮没于历史，祈英烈忠魂福佑乡梓百姓，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再次出资3000万元，隆重修葺烈士陵墓，辟地扩建纪念馆，以资后人凭吊祭奠。值此建峻，勒石为记，永世留存，谨志不忘。

为解放上海浦东战役而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碑文主题鲜明、行文朴实、意韵深远，高度概括了解放上海浦东战役的时间地点、战略安排、战斗过程和重大意义，肃立诵读，令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争分夺秒、勇往直前的必胜信念

浦东西临黄浦江，东濒大海，北接长江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上海的水上门户，也是上海守敌从海上逃走的必经之地。因此，浦东战场关系到我军两翼分兵钳击吴淞口、截断敌人海上退路的战略大局。我军自4月20日南渡长江以来，连续行军作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接到解放浦东这个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后，将士们没有丝毫犹豫，不顾疲劳坚持连夜行军抢夺时间。当时正值江南梅雨季节，雨一连几天个不停，海边气候变化又大，风雨时缓时急，道路泥泞难行。入夜以后，乌云压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部队只能在风雨、泥泞和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我军将士们相互鼓励、相互扶持，奋力前行，滑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赶，吃饭的时候都舍不得停下来，边赶路边吃干粮，每个人只想着怎么能快速到达指定地点，消灭敌人。经过四天四夜的急行军，我军长途奔袭420多里，全部抵达预定地点，为接下来的作战行动赢得了宝贵时间。

内蒙古地区第一批共产党员的诞生

□ 王永丽 兰继华

的前途和命运。

在党的指引下接受真理。1923年秋开学不久，李大钊就派人到蒙藏学校接触多松年、乌兰夫等青年，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中共北方党组织先后派遣共产党员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韩麟符等来到蒙藏学校，教育和引导这些热血青年。他们首先和这些学生谈心交朋友，谈个人前途，也谈国家大事，讲述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揭露北洋军阀的罪行，同情和关注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青年们也争相介绍内蒙古的历史与现状，诉说内蒙古地区各族群众的苦难生活，包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北洋军阀政府的盘剥、蒙古王公的压迫等等。

李大钊还亲自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深入学生宿舍，与青年学生促膝谈心，交流思想，还询问青年们的家庭情况、生活生计、求学经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分析内蒙古的历史和现状，启发青年学生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青年学生们听到这样新鲜的道理和亲切的教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党的指引下，这批热血青年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迅速活跃起来。他们除了在校学习文化知识外，还参与了党领导下的校内外各种革命活动。随着党在蒙藏学校开展工作的不断深入，中共北方党组织对这批进步青年倍加关心，进一步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推荐他们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

1924年上半年，邓中夏在宣武门内的一座破庙里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



坚守阵地、寸土不让的革命意志

高桥争夺战是浦东战场上最激烈、最艰苦的战斗。高桥镇位于浦东最北端，三面临水，扼长江和吴淞口之咽喉，是敌军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敌军利用日寇所修建的工事，在这一地区构筑了星罗棋布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堡垒群，外围设有木栅、竹签、铁丝网等四五道副防御工事，还利用高楼，组织两层火力瞰射，配合地面堡垒，构成严密的立体火力网。

5月19日开始，高桥外围争夺战正式打响，我军同敌人展开了五个昼夜的拉锯战。从拂晓到黄昏，敌军不停向我军阵地倾泻炮弹，在坦克掩护下，他们的步兵向我军发动多次反扑。部分阵地多次被突破，我军战士奋勇回击，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战斗中，我30军89师266团3营勇往直前，一马当先，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要害，激起敌人更加疯狂的反扑。面对数倍于己的顽敌，3营将士毫不畏惧、坚守阵地、寸土不让，弹药打光了，就组织战士趁战斗间隙跑到阵前捡拾敌人留下的武器弹药，其余人员抓紧抢修防御工事，绝不后退一步，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以顽强的革命意志顶住了敌人连续四次猛烈攻击，直到后续部队到达后3营才撤下阵地。

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5月20日夜，进入高桥外围作战的我31军92师遭遇顽抗，其中275团5连在进攻蔡司庙时，190人的连队牺牲近50人。天亮后，敌人的飞机、军舰及吴淞口炮台的大炮向蔡司庙等我军阵地狂轰滥炸，5连顽强坚守、伤亡惨重，副指导员牺牲，至5月21日晚仅剩11人。268团2连在进攻敌人地堡时，被地堡周围的地雷阻拦。副连长马上组织突击队勇敢地冲上去排雷，但狡猾的敌人从暗堡突然扫射，副连长和突击队员战士都倒在血泊中。正在指挥作战的连长强忍悲痛，带着另一支突击队突袭到敌人暗堡前，没想到又有一个暗堡响起了枪声，连长也牺牲了。连队战士们见状，不顾一切地冲锋到敌人母堡下，将20多斤重的炸药包从机枪射孔塞进母堡，敌人的碉堡瞬间化为灰烬。战斗结束后，整个连队只剩6名战士。在将士们的英勇战斗下，我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5月25日夜，我军攻克高桥，26日中午肃清浦东地区守军残部，27日解放上海。



内蒙古地区第一批共产党员的诞生

义学习小组，蒙藏学校的多松年等人参加了学习。他们在邓中夏等人的讲解和辅导下，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这批青年常常围在宿舍的火炉旁讨论时局，探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就是在这个不平常的寒假期里，乌兰夫、奎璧、赵诚等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天开学后，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孟纯、云润等人也相继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成立了团支部，多松年、乌兰夫先后任团支部书记，这是蒙古族第一个青年团组织，后来团员发展到42名。这样，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成功地把这批先进青年团结在了党的周围。

1924年下半年起，在党的精心培养下，这批来自祖国北疆的青年相继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他们的入党仪式都是秘密举行，简单而庄重。1923年至1925年间，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的喀喇沁右旗蒙古族青年白海风、乌文献和察哈尔正黄旗蒙古族青年纪松龄等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下，他们从活跃的热血青年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内蒙古地区的第一批共产党人在北京产生了。

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共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建立了由蒙古族党员组成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即中共蒙藏学校支部，多松年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

在斗争实践中加强历练。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为这些新生党员讲授马